



讀「大唐西域記」

幻生

今年春間，去華埠東禪寺，承浩霖法師送我一冊「大唐西域記」，盛情至為可感！這本「大唐西域記」，為一九七七年十月出版，三十二開本，四號字排印，三百餘面。紐約華埠書肆出售，美金一元八角。

就現存「大唐西域記」各種古今版本比較而論，當以這本「大唐西域記」最佳。它底特色，並非以印刷裝釘美觀取勝，而是

切實地做過一番精心的整理工作。分段、標點，對照各種古本校勘，作有校勘注釋；每卷中安立許多子題及分題，非常顯目易讀。經過這番整理工作之後，將一本古典的書籍，變成一本段落分明，新式標點符號的現代型書籍。文意明確，讀來省力。我對浩霖兄以此書相贈，如獲至寶，欣喜無量！

五六年前，我在台灣德山寺過山居閱藏生活，曾經一度想對「大唐西域記」做番校勘、注釋、分段、標點整理工作。我從中日文獻裏，知道日本有若干種「大唐西域記」的古本，我國也有

若干「西域記」的古本。可是，一個山居闕藏的人，一向極少活動，更無人事關係，要去訪求借用古本，委實不是一件易事。古本既然無法得到，校勘工作無從着手進行。現在有人做了這一工作，印行出版，對一個曾經想做而未做的人而言，既是欣喜，更有一窺其整理成果的必要。

仔細地讀完「大唐西域記」前面的「前言」，掩卷長思，在中國古代的典籍裏，對中亞一帶的記載，沒有其他一本典籍有「大唐西域記」記載如此詳細的。

在「前言」中說：

「西域記」也是研究我國西北邊區民族歷史地理的好材料。它所記述的一百多個城邦、地區和國家中，有的在我們新疆境內，如阿耨尼（焉耆）、屈支（庫車）、跋祿迦（阿克蘇）、竭盤陀（塔什庫爾干）、烏鐮（英吉沙）、佉沙（喀什）、斫句迦（叶城）、瞿薩旦那（和田）、折摩馱那（且末）等。我國自秦漢開始形成統一的多民族國家，對於邊區兄弟民族的記載歷來很重視，一部廿四史除「北齊書」、「陳書」外都有民族傳記；又有各種專門著作，但留傳至今像「西域記」這樣具有豐富內容的實屬不多，書中不少記載是並世無二的。例如：我國自漢代起，二千多年間，一向把崑崙山脉西部高山地區稱作葱嶺，「西域記」卷十二始見有波謎羅川的記載，指出是葱嶺的一部分，「其地最高也」。這是我國古籍中首次提到的關於帕米爾這一名稱的地理概念的認識。又如：卷一講到在坦邏私城（今江布爾）南十餘里地方，有一座由三百多戶內地人民轉居在那裏而建立的城邑，位置較唐代著名詩人李白的出生地碎叶城（即「西域記」的素叶水城）猶西。這表明在莫斯科公國形成前許多個世紀，我國內地人民的汗水早已灌溉着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的亞土地，對於蘇聯胡謔的有關我國古代西部邊界的許多無耻謾言，都是有利的駁斥。

「前言」中又說：

玄奘在這部書中追述了親身經歷的一百一十個和傳聞得

知的二十八個以上的城邦、地區、國家的情況，內容十分豐富，山川地形，城邑關防，交通道路，風土習俗，物產氣候，文化政治等無不歷歷在目。文筆樸實嚴謹，絢爛雅緻，簡扼流暢。涉及的地區又是異常廣濶，從我國新疆西抵伊朗和地中海東岸，南達印度半島、斯里蘭卡，北面包括今中亞細亞南部和阿富汗東北部，東到今印度支那半島和印度尼西亞一帶。由於這部書的記載，七世紀中亞、南亞等國的概況躍然紙上，而這一地區的古代歷史和地理的文字資料留傳下來的很少，「西域記」因此顯得格外可貴。近代從事中亞、南亞歷史和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學者，無不把「西域記」作為一種重要的基礎資料，歐洲和日本的學者都會對本書進行過翻譯和研究。其價值之高，可見一斑。

「前言」，共分四節，約四千餘字。我們從全文平實地分析，有些寫得非常中肯，有些論點不無商榷之必要。如第一節中論到玄奘西行求法的動因，因為佛教自魏晉南北朝以來，由於佛教內部派別的爭論，有礙於佛教作用的發揮；理論上的不統一，產生思想派別的分歧，彼此說法不同，爭論不休，莫衷一是。雖然引用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」卷一的文字作證：「義類差舛……大乘不二之宗，析為南北兩道，紛紜爭論，凡數百年，率土懷疑，莫有匠決。」但是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」敘述玄奘西行求法的動因，不止一端，玄奘因許多論典尚未傳來，在義理上無法探尋究竟，故去印度尋求原典，以明原委。所以資料的引用，應該顧及到全體，不要偏於一端，偏於一端而作片斷的引證，其所論述的當然有欠公允了。至於說到魏晉時代統治者利用佛教為自己宣揚聲勢，佛教派別林立是很自然的。我想，在一千多年前的舊中國社會裏，君主統治，那時的人們，大抵還不會利用佛教宣揚自己的聲勢。佛教派別林立，是基於義理的解釋與看法不同而起，並非統治者的利用而出現的。古代的人們，對於宗教的信仰，大體是至誠的，沒有想到利用宗教做為政治工具。所以，我們不同意這種說法與看法。

此外，「前言」的第二節，說到玄奘回國，唐太宗對其寵待

的原因：

貞觀十九年（公元六四五年）正月回到長安，結束了他歷時十九年，跋涉五萬餘里，備受艱辛，名聞世界歷史的偉大行程。玄奘途經于闐時，遣人上表唐太宗，陳述自己「不見迹，聞未聞經，窮宇宙之靈奇，盡陰陽之化育」的不平凡經歷，引起了唐太宗的興趣，下敕迎歸。「近京之日，空城出觀」。這種盛況與當年玄奘啓程時的冷落情景不可同日而語。玄奘回到長安後不久，唐太宗又在洛陽召見了他。唐太宗這樣寵待玄奘，並不是因為玄奘帶回了大量的佛經和他闡發的新教義，而是在于玄奘經行西域各地十多年的親歷見聞。他對玄奘說：「佛國遐遠，靈迹法教，前史不能委詳，師既親睹，宜修一傳，以示未聞。」唐太宗還勸玄奘「罷道助秉俗務」，希望他能還俗做官（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」卷六）。玄奘沒有答應，只是願意把自己在西域的見聞寫出來。他在回長安後的第二年，就完成了這部「西域記」的撰述工作。

依據「前言」的這段文字所說，唐太宗寵待禮遇玄奘，並不是因為玄奘由印度帶回來大量的佛經和他闡發的新教義，目的而是在玄奘經行西域各地十多年的親歷見聞，希望玄奘把它寫出來。唐太宗爲什麼要重視玄奘西域各地的見聞？因爲唐太宗要積極征服西突厥，必須了解西域各地的情形，而玄奘恰好又剛從印度回來，了解西域當地情形最多，故成爲唐太宗的上賓，熱切地要其寫下經行西域的親歷見聞，作爲用兵征服的參考。假如唐太宗要玄奘作西域記的目的如此，則玄奘無疑地成了一個披着袈裟外衣的所謂「間諜」人物。以探知外國情形，做爲自己國家征服侵略的準備，果真如此，我不知道玄奘在中外人士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又如何建立起來？我想以宗教外衣而做實際的政治工作，這是來自近代西方宗教的傑作，以及共產國際訓練出來的宗教人員。在古代的中國人，可能還沒有想到這一層。這是很難獲得其他人所能同意的。

第三節中，對於唐太宗要玄奘寫西域記的目的，說得非常詳

細。唐太宗爲了打通中西交通，完成統一大業，消滅西突厥，玄奘也充分領會唐太宗的意圖，撰寫西域見聞，則玄奘無疑地成了唐太宗消滅西突厥的幫兇。雖然書中引用「西域記」末後的文字，以及玄奘「表」中的語句，作爲文證，但從另一個立場來看，其解釋也許並不如此。就「大唐西域記」全書觀之，玄奘着重記述的，宗教的記述顯然多於人文地理歷史，以這樣一部典籍，如果將它看做政治侵略的工具，與政治糾纏一起，這是帶了有色眼鏡，沒有看清「大唐西域記」的真正面貌，殊令人興嘆！如果真是「玄奘充分領會唐太宗的意圖」，那末，玄奘爲什麼不爲唐太宗單獨寫一本純粹關於政治歷史地理的著作，爲什麼要在書中滲雜着許多宗教的記述？唐太宗所要征服消滅的，僅是西突厥，打通中西陸上通道，而玄奘「西域記」記載的範圍極廣，包括中亞、西亞及南亞次大陸印度半島在內。玄奘這樣地記述其西行見聞，豈不是超過了唐太宗所需要的範圍之外？

至於唐太宗答玄奘書所說：「朕學淺心拙，在物猶迷，況佛教幽微，豈能仰測。……新撰『西域記』者，當自披覽。」據說：「就是說，他（太宗）本人對那套玄奧莫測的佛學是不感興趣的，而「西域記」則要好好讀一下。」所謂：「朕學淺心拙：……」究竟是唐太宗的自謙之詞，還是他對玄奘與莫測的佛學不感興趣，這是值得研究的。若果他對佛學不感興趣，那末，他爲什麼要用國家的支付命玄奘譯經？而唐太宗當着大臣之前爲玄奘撰寫的「大唐三藏聖教序」，我們細讀其文，唐太宗對佛學並非完全不懂，也不能說他對佛教全不感興趣！這是大家可以體會到的。

二

玄奘這部「大唐西域記」，與我似乎結了不解之緣。民國三十七年（一九四八）秋天，我在上海靜安佛學院讀書，特地到商務印書館買了一冊「大唐西域記」。不久，逃難播遷，別的書差不多都丟光了，唯有這本「大唐西域記」沒有丟失。那時我雖然看不懂「西域記」，但是對它却有一股莫名的喜愛。後來由於知識漸開，閱讀佛典的相關史料，我便常常翻閱「西域記」；「西

域記」彷彿成爲手邊的辭書一樣。「西域記」我究竟翻閱過多少次？我自己也無法記得。片斷的閱讀，寫文引證，最保守的估計，大概一二百次是有的。

四五年前，我在德山寺山居閱藏，日月潭玄奘寺廣忠法師，發心重印「大唐西域記」，他將第三校稿送到德山寺請我校對一遍。玄奘寺重印「大唐西域記」，所用的底本，便是商務印書館的版本。商務印書館在大陸時代，曾將「大唐西域記」列在國學基本叢書裏出版，在台灣影印再版，又將「大唐西域記」列在該館「人人文庫」裏。我爲廣忠法師校完了第三校稿樣之後，又對照大正藏本，做了一次精細的校勘工作，改正了許多標點符號與分段的段落。做完這番校對工作，整整花去我半個多月的精力與時間。從大正藏本與商務本的校勘所得，我知道商務本有不少錯字和「衍文」，對於此事，我特別寫過一篇「校讀大唐西域記」的文章，刊登在菩提樹月刊上。差不多過了一年以後，始終見不到玄奘寺重印的「大唐西域記」出版。一次，我問廣忠法師，「大唐西域記」的出版情形如何？想不到廣忠法師告訴我，該書的版樣已經拆掉了，沒有印書。我唯有歎息而已！從此以後，我獲得了一個做人的經驗，凡是不是真正從事文化工作的人，最好少打交道。排好了的版樣，經過三校，不印書，而將版樣拆掉，只要付與印刷廠應得的排版費，事情非常簡單，可是，那些從事校對校勘者所花去的精力時間，完全成了毫無代價的白費。

約莫過了一年光景，我在商務印書館復刊的「東方雜誌」八卷二期上，讀到以商務編審會署名發表的一篇文章，題爲「大唐西域記譯撰的問題」。這篇文章的論點，說明有位大學的知名教授，告訴該館，「大唐西域記」署爲「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」，似有未妥。該館編審會據此發言，引用四庫全書提要等資料，說明該館版本之依據。同時也引證「大唐西域記」末後辯機「贊記」之文：「爰命庸才，撰斯方志。……恭承志記，倫次其文，尙書給筆札而撰錄焉。」（大正五一·九四七中）肯定「大唐西域記」爲玄奘譯辯機撰的這一論點，「是站得住的」！我讀完了商務編審會的這篇大文之後，深深感覺到商務編審會的諸先生過於

無知，玄奘的這部「大唐西域記」，依據近人張君勳先生的調查，已有十多種不同文字的譯本，早經成爲一本世界名著，西歐及日本學者，更有研究「大唐西域記」的專著問世。這本書究竟是玄奘「譯」或「撰」的問題，我國古籍早已記載得清清楚楚，外國學者也研究得明明白白，根本不成問題。可是商務編審會的先生，却獨具慧眼，昧於史實，強調它是「譯」而非「撰」的，而且是站得住的，真是令人啼笑皆非！我根據所知的古籍資料，針對這一問題，撰成一篇「大唐西域記譯撰問題之我見」。我的這篇文章論點，首先說明「大唐西域記」這本書的來源，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」裏記載非常詳細明白，貞觀十九年（六四五）正月，玄奘從印度回到長安，不久唐太宗在東都洛陽召見玄奘，詢問玄奘留印十七年及途中見聞，玄奘備述其情。最後唐太宗說：「佛國遐遠，靈跡法教，前史不能委詳，師既親覩，宜修一傳，以示未聞。」（大正五〇·二五三中）這是玄奘撰著「大唐西域記」的起因。玄奘回到長安，與譯經沙門辯機合作，於譯經之餘，由玄奘口述，辯機撰錄，經過一年多時間，完成這部十二卷的「大唐西域記」。玄奘呈書給唐太宗的「表」中說：「今所記述，有異前聞。雖禾極大千之疆，頗窮葱外之境，皆存實錄，匪敢雕華。謹具編裁，稱爲大唐西域記，凡一十二卷，繕寫如別。」（大正五〇·二四五中——下）唐太宗收到玄奘書後，親自回信說：「省書具悉來意。法師夙標高行，早出塵表，泛寶舟而登彼岸，搜妙道而闢法門，弘闡大猷，蕩滌象罪。是故慈雲欲卷舒朗之蔭四空，慧日將昏朗之照八極。舒朗之者，其唯法師乎？朕學淺心拙，在物猶迷，况佛教幽微，豈能仰測？請爲經題，非已所聞。又云：新撰西域記者，當自披覽。」（大正五〇·二五四下）我們從玄奘與唐太宗來往的文字裏，根本沒有見到稱「大唐西域記」爲「譯」，只見用「新撰西域記者」。我們由當事者第一手的文獻資料證明，「大唐西域記」怎麼能夠稱爲玄奘譯，而且「譯是站得住的」？

（未完待續）